

勵耘學刊

二〇〇七年 第五輯

學苑出版社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07 年第 1 辑

(总第 5 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励耘学刊. 第5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77 - 2977 - 1

I. 励… II. 北… III. ①文学研究 - 文集 ②语言学 - 文集
IV. I0 - 53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337 号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 - 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 36 印张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字 数: 600 千字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版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80.00 元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励耘学刊》(文学卷) 编委会

顾 问: 童庆炳

主 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 山 杨联芬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宁	乐黛云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 强	吴福祥	陈思和
杨 义	杨联芬	张涌泉	张 健
项 楚	郭英德	曹卫东	黄开发
盛 宁	温儒敏	蒋原伦	

冯胜利 (美国) 大西克也 (日本)

金文京 (日本) 竺家宁 (中国台湾)

黄坤尧 (中国香港) 李欧梵 (中国香港)

《励耘学刊》(语言卷)编委会

顾问 王 宁 何九盈

主 编 李运富

副主编 刘 利 孙银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宁 乐黛云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 强 吴福祥 陈思和

杨 义 杨联芬 张涌泉 张 健

项 楚 郭英德 曹卫东 盛 宁

温儒敏 蒋原伦

冯胜利(美国) 大西克也(日本)

竺家宁(中国台湾) 黄坤尧(中国香港)

李鸥梵(中国香港)

编 务 陈 灿

目 录

新思维

- 文学理论、文化翻译和比较文学的前途 [美]何谷理\ (1)
- 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
- 与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下) 陈国球\ (22)
- 一个时代的文学病案 张 柠\ (39)
- 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视野中的柏拉图 王丽丽\ (52)
-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视觉模式论 路文彬\ (68)

先秦两汉学术专题

- 从“物理之后”到“伦理之后”
- “元亨利贞”诠释意涵解析(下) 赵中伟\ (86)
- 周礼的行为特征 李 山\ (98)

文学史专题

- 从山水的诗到诗的山水
- 论梁朝山水诗的承传 郭思豪\ (105)
- 《牡丹亭》与明清女伶 谢拥军\ (119)
- 晚清民族主义与异域历史演义 沈庆利 刘 伟\ (132)
- 女子高等教育与现代女性“为人”与“为文”的双重自觉
- 以女高师作家为例谈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
- 的知识结构与教育背景 王翠艳\ (144)
- 捍卫的代价
- 臧克家与当代文学权威话语 毕光明\ (161)

余华近作《兄弟》(上部)的一种读解 谭五昌 \ (167)

文化研究

晚清女权话语与民族主义 杨联芬 \ (175)

民国时期上海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

主体性及他们的咖啡文化 彭丽君 \ (193)

以批评为教育:1930 年代李长之

文学批评的学院背景 季剑青 \ (217)

青年园地

《秋胡变文》以及秋胡戏妻故事流变略考 刘子立 \ (228)

论南朝乐府琴歌新变与清商乐的关系? 周仕慧 \ (237)

沦陷时期北平的女性写作 罗锦贤 \ (249)

文史名家

古经史学家高步瀛 聂石樵 \ (261)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 董晓萍 \ (266)

品书录

《子夜》世界语译本序 李 岫 \ (272)

《励耘学刊》(文学卷)征稿启事 (276)

目 录

古“殳”非“杖”乃“椎(锤)”考论	朱维德(1)
《汉语大字典》(卷四)不明关系字疏证	钟如雄(18)
《汉语大词典》“末界”释义考辨	李玉平(41)
部分中医术语的名源及其文化阐释	黄海波(51)
释“料掉”“了鸟”	刘 波(63)
万光泰《古韵原本》校注	张民权(75)
《白虎通义》声训疏证	吴泽顺(115)
《祖堂集》的词汇学价值	詹绪左 何继军(137)
《吴越春秋》词汇刍议	杨海峰(164)
从表示病愈的词语更替看词汇的发展规律	姜 燕(176)
《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	程国煜(187)
《型世言》程度副词计量研究	郑燕萍 曹 炜(206)
《古汉语疑问范畴词典》读后	刘 利 张晓燕(216)
汉语词源研究史中的汉字观	陈晓强(221)
黄季刚字词关系研究方法要略	韩 琳(266)
汉语行为称数法研究综述	于立昌(278)
《励耘学刊》(语言卷)征稿启事	编辑部(287)

文学理论、文化翻译和比较文学的前途

◇何谷理(Robert E. Hegel)^①

摘要:本文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可能,以什么为基础,通过何种方式具体操作等。通过对翻译及“外来性”等问题的考察,本文指出:文学文本中的情感、经验和想象正是我们彼此理解的基础,因此,比较文学的出路在于以人类共通情感为基础,以翻译和具体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细读为手段,力求促进不同文化母体间的相互理解。

关键词:比较文学;翻译;外来性;情感;文化语境;文本细读

在当前对比较文学的讨论中,有几个论题似乎处于,或接近于核心的位置。今天,我想谈谈这几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恳切地希望得到你们的回应。我所讲的将更为抽象而非具体,我所强调的将更多的是理想状况而非现实实践。它们部分地构成了我对个人——特别是我自己——在文学研究中的位置的反思,而且也应该从这种角度来加以理解。

第一个论题是:当前,比较文学是,并且应该是理论的家园——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甚至可能包括政治理论,尽管后者并不是我今天要谈论的话题。我所谓的“理论”不同于“哲学”^②。哲学关注的是抽象观念、思想体系和解决知性问题(对某些人来说也就是理性游戏)的方式;理论关注的则是理解文学的方式,而文学又是思想、经验和情感的艺术表现,是

^① 何谷理(Robert E. Hegel),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博士(197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② 要理解这种区分背后的文化差异,可参看杜登(Michael Dutton),《别把我们引入翻译:关于亚洲研究之理论基础的笔记》(Lead Us Not into Translation: Notes towar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epantla: Views from the South* 3.3, 2002, 495-537)。

经由个人想象塑造的。作家并不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作品中的全部因素,但是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生,我们则要努力做到这一点。文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并不是郑重的宣言,相反,它们应该是行动的先导,这种行动既指对文本及其语境的解析,也指产生文本的充满创造力的世界中的人类行为。理论可以为实验室、研究所、课堂中的学者提供导向,理论同样可以为社会行为提供导向。列宁就曾说过理论应该成为行动的先导^①;文学理论不是政治理论,但同其他思想领域一样,确实与政治有关。

第二个论题对每个人来说大概都是显而易见的:翻译以及基于翻译的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世界上的作家们已经用很多不同的语言创造了有价值的文本。每个人都可能掌握多至十种左右的语言,但没有人能掌握足够多的语言以进行大范围的、全球性的比较。只有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视野的拓展才为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都赋予了研究价值。^②如果想进一步拓展理论使之有助于理解人类共同的文学遗产,我们就需要大范围的比较。为了对我们母语之外的语言文学有所了解,我们别无选择地只能求助于翻译文本,继而我们自己也要为我们的学生和其他读者提供翻译文本。我觉得,常常是在我们必须用另一种语言复制一个文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把握它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层性。^③对我来说,即使是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也是一种产生意义的阅读过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文化、语言、个体之间的翻译是我们学科核心的和本质性的工作。

我的第三个论题是:我们不能忽视语言在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V. I.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 - Wing Communism -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另见中文本《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卷50-51页)。感谢王国军告诉我中文版编者在此添加注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并同时告诉注释所指文字实际上是在批评德国人:“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但列宁在此似乎并未指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处论断,因为他的告诫是严肃性的而非讽刺性的。

② 关于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结合,王宁有富于启发意义的观点,见其《“一个学科的消亡”?——中国比较文学之全球/区域定位》(*“Death of a Discipline?” 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eohelicon* 33, Budapest 2006. 2, 147-161)。

③ 对于这种程度的“亲近”,斯必伐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作了最为有力的论述,见其《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收入其《在教育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179-200)。

主义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语言的政治地位甚至影响到翻译的内容、方式和原因,进而影响到我们研究对象的选择。^① 为什么我受邀请越过半个地球来到这里,然而依然用我自己的语言演讲呢? 去年八月,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会议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我的大多数同事都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很少人会讲汉语,但是他们中没有人对英语在中国成为通用的学术语言感到奇怪。如果我的大学在圣·路易斯召开一次综合性学术会议,而把中文作为唯一的报告语言,很多人会抱怨说不讲中文的人会被排斥在外——确实如此。显然,对权威性交流语言的选择就决定了谁被接纳入对话,谁被排除在外。理论应该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对语言的选择既限制了我们自己也限制了他人。

政治——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压力——就隐藏这样的一些选择背后。这些压力来自政府,包括你们的政府,也包括英语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但进一步说,对英语的需求源于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英语是一种处于较高地位的语言:人们可以用它做生意,可以用它接待游客,可以用它进行外交。更为重要的是,英语也逐渐在变成一种全球性学术语言。但我们不应误认为英语会一直垄断学术与商业活动中的特权地位。英语在上个世纪里取代了法语;不用着急,只要中国继续在各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在你们的有生之年英语的位置很可能就会被汉语分享甚至取代。^②

在国际交流中,语言的选择涉及一些实际问题,包括学习语言的困难。例如,我本人并不十分擅长语言学习,我对几种语言的掌握也是很有局限的。相反,有些人可以相当快、相当准确地理解新语言并且用之于交谈。但是,正如美国军事语言学校(US Armed Forces Language School)主任最近所说,即使一个人已经可以相当熟练地讲一种外语,这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完全理解用这种语言所说或所写的所有内容。很显然,任何一种语言都植根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母体,这种文化母体与正在使用和曾经使

① 关于过去及现在对翻译的普遍政治态度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进行了深刻的评论,见其《中国和西方的翻译思想》(*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收入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所编《建构文化:关于文学翻译》(*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Eng.: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p. 12-24)。

② 关于海外汉语学习的逐渐升温,特别是在美国,参见拙文《作为一种全球文化讲授中国》(*Teaching China as a Global Culture*,《淡江学刊》英文版 *Tamkang Review*;台北,即将出版)。

用过这种语言的所有个人是同样复杂的。要想完全适应另一种语言中的生活需要多年的学习和经历,而这还仅仅是“一种”语言,要想对多种语言和文化达到同样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耗费一生的时间。但我们的时间通常为其他的事情所占据,而非学习语言和文化。这常常意味着比较分析主要集中在文本,而对文本最初写作或“消费”的语境仅仅给予非常有限的关注。

这必然要引出第四个论题。理想地说,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的文化中的文本,比较研究是最易成功的:我们必须对文本产生的原始语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学习一种文学必然要求学习它的文化背景,对文本所处文化语境的有限了解很可能导致同样有限的阐释。如果我们比较一系列文本或文化传统,而对它们只有很肤浅的理解,那么我们的比较和阐释可能会没什么价值:那可能会流于简单地玩弄词汇和概念,脱离了文本实际以及创造文本的个人和文化。

这是我们不容回避的事实:只有借助于翻译,广泛的文学比较才是可能的。但是除非我们对文学文本及其文化语境进行彻底的研究,我们的文化比较——不管其术语多么发达和完备——都面临着流于肤浅的危险;没有对语境的考虑,我们很可能会忽视文本真正的文化意义。要想真正理解文本并最终理解创造这些文本的人,仅仅求助于翻译是永远不够的。后面我会再谈到这一点。

文学研究中的“外来性”(Foreignness)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似乎必须处理对我们来说是“外来”(foreign)的东西,至少作为个人来说如此。但就翻译而言,“外来性”这一概念有两个独立的方面是我要探讨的。

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许多重大贡献都是一群犹太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作出的。随着席卷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兴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从德国的大学里被驱逐了出来。^① 像列奥·施皮泽(Leo

^① 参看艾弥丽·爱普特(Emily Apter)的《全球翻译:比较文学的“发明”》(*Global Translatio: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 in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ed.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pp. 76 - 109); 该文又见爱普特的《翻译地带:一个新的比较文学》(*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1 - 64)。

Spitzer) 和艾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这样的学者都熟悉非常多的语言;正是由于他们对现代欧洲思想文化的广泛了解,土耳其支持现代化的总统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 1881 - 1938, 其生卒年与鲁迅近乎完美地吻合)将他们邀请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们的任务是将源于欧洲的非宗教的世界主义带到新近世俗化的土耳其。但正如美国学者艾弥丽·爱普特(Emily Apter)最近指出的,这些欧洲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将土耳其语言和文化视为与德语、法语、英语以及他们研究所用的拉丁语处于同等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与土耳其邻居的语言隔离之中,显然,他们将这些邻居视为“异质的”(foreign)。

和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伙伴一样,列奥·施皮泽是个坚定的语言学习者。他经常性地阅读并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引用至少二十种语言,因此,他对我们这些只懂得几种语言的人很少同情。但与后来的很多学者不同,施皮泽从不对他著作中采用的任何引文进行翻译。他如此杂用语言似乎有两个目的——首先,他显然是要激励他的读者学习更多的语言;但施皮泽同样是在坚持保存他所处理的原文中那些“微小的语言细节”。这就是他为什么保存了艾弥丽·爱普特所谓的原作的“语言陌生性”(linguistic strangeness):他希望原作的“陌生性”能够贯穿始终。^①

让我们思考具有两种不同意义的“外来性”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渴求熟悉性,因为尽管我们需求新奇的事物,但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好奇心以我们熟悉的方式被满足。在尝试一种异国新食物时,我们可能希望它以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似已习惯的方式烹制和服务。“千年蛋”(thousand-year-old eggs),即皮蛋,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相当具有外来色彩的,但当它们出现在一种熟悉的汤中时,它们看起来可能就不那么陌生了。当想到其他的文化或政治体系时,我们用与我们个人或集体经验相呼应的语汇去描述它们。商业交易与国际外交活动也依靠熟悉性,敏感谈判的参与者都要确信所使用的语汇是清晰无歧义的。

但我们也都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同,接受一点儿外来性。例如,在美国,我喜欢和来自中国的学生及同事去中国餐馆。直到最近,圣·路易斯这样的城市中的大多数中国餐馆都依靠非中国顾客维持生意,因此,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食谱和服务风格以满足一般美国人的期待。二十年

^① 参看爱普特在《全球翻译》(*Global Translation*) 105 页所引列奥·施皮泽的话;这篇文章是我对列奥·施皮泽评价的事实基础,但并非我的解释的基础。

前,我的中国同事常常评论所谓的“中国”菜与他们所期待的有多不同,但常常,他们发现这种口味也是不错的,只不过不是真正地“中国”,而是更“美国化”而已。只是最近,圣·路易斯以及其他一些更小的城市才拥有了如此多的中国顾客,以致于有些餐馆的菜实际上与北京的菜已经差不多了。在回归本色的过程中,在重新烹制中国人所熟悉的饭菜的过程中,这些餐馆也在改变着圣·路易斯新一代的非华裔人群。因而,非华裔美国人逐渐对更纯正的中国菜产生了热情,他们和中国人一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进入更为“中国”的中国餐馆。中国饭菜依然与通常的美国食品不同,但很显然,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看作“外来的”。“外来性”,与许多其他因素一样,是个相对概念;它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而每个观察者的视角都随着他对事物的逐渐熟悉而改变。但这里有个麻烦的问题:“真实性”(authenticity)是否取决于个人口味以及事物看起来有多熟悉呢?毕竟,真实性可能不是一种客观性质。

“外来性”有时看起来似乎存在危险,但更多情况下仅仅会带来麻烦:陌生的事物比熟悉的事物更难处理。战争期间,很多在伊斯坦布尔任教的德国知识分子与说着同样语言的欧洲人的社会联系受到限制,在流亡国外的人当中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不管他们本国的文化和居住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北京的美国人经常聚集在一起,正如圣·路易斯那些团结的中国社群。那些从事欧洲文学研究的杰出的西方学者中,似乎仅仅施皮泽曾试图认真学习土耳其语。我们已经提到,他用非常多的欧洲语言阅读,涉及几个非常不同的语族,既有古代语言也有现代语言。但就是施皮泽也宣称自己对栖身地语言的理解是有限的,就连列奥·施皮泽这样的世界型学者也发现土耳其语是“不同的”(foreign),因而难以有效使用。我相信他不曾尝试分析土耳其语的文学作品。很遗憾,即使我们自认为是世界主义者,一些与我们的口味不相符合的语言和文化看起来依然是“异质的”(alien),即便它们本质上并非如此不同。

翻译的问题

我可以读懂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但我阅读得很慢,而且这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这些语言的某部文学作品有合适的英译本,我不可避免地会依赖英译本。我说这是因为阅读那些原文作品必须对其中的语法结构进行“解码”(decode),但实际上我担心即使自己抓住了文

章的大概内容,也会错过言外之意、典故含义——亦即其完整意义;我担心自己仅仅是在进行表层阅读,丢失了潜在含义,而后者正是我们在阅读时所探求的真正意义。

因此我需要翻译,正如每个读者都需要翻译。如果我们想进行广泛的阅读,或者了解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我们别无选择地要诉诸翻译文本。但是对于这些翻译的性质和质量我们必须仔细审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翻译会不会将我们误导入虚假的自信——译文是否看起来如此熟悉以至于忽略或掩盖了原文的完整意义?它是否会遮蔽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事实差异?不管译者的技巧如何,成功与否,我们作为读者是否会将太多的熟悉性归结于原文本身以致忽略了原文的“外来性”?^①再拿餐馆来比喻,我们对饭菜“真实性”的判断是否依赖于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有多熟悉或多么具有异国风味?

如同各国首脑签署的官方文件的翻译一样,文学翻译也会发生意义的偏离,有意地或因为无知而无意地。在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英文译本时,我会被其中明显的误译震惊,作者不了解原文中对中国政治或历史事实的指涉而对文字进行强行的扭合。^②这种情况下的译者往往学习中文时间不长,其中文语言技巧超过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种错误是令人失望的,它意味着原文的一些本质性文化底蕴——以及原文的一些意义——都不能清晰地传达给那些完全依靠英文译本的读者,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忽视译者的无知,但至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更努力地学习,更多地学习,以便在将来的工作中少犯这样的错误。

然而,对于不同文化间的理解更为危险的是译者为了使译文对新的读者更为熟悉而对原文进行的有意“修正”(correct)。历史提供了无数的例证。在美洲国家里我们看到16、17世纪美洲本土宗教文本的西班牙译本,译文为了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术语相一致而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在中

① 弗里德里希·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1813年的作品中已经质疑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借以保存原文“外来性”的手段。见《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摘引入《翻译理论》(*Theories of Translation*, ed.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32-54; esp. pp. 46-48)。

② 一个例子是: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艾梅霞(Martha Avery)译(1985; New York: Norton, 1986);见其中涉及庄子及其所谓 Si Maqian(姓司马名迁)的人物的文字,如144页。

国我们看到 19 世纪中英外交通信中为满足英国人的期待而对中文语汇进行的过度翻译(over-translation)。对中国古代词语“夷”的意义的故意歪曲是一个众所周知而且令人痛心的例子:“夷”的说明性意义——如“东夷”指“来自东方的外国人”——在英译中被改换成了“未开化之人”(barbarian),实际上与“野蛮人”(savages)是同义的。因而,一个源于古典文本、指示文化差异的普遍说明性词语在含有偏见的英国译者眼中被歪曲为种族主义的蔑称,这个词就被解释为象征着对英国君主的不敬和无礼。这一“过度翻译”也就被英国用作发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的又一条理由。^①

由此可见,翻译能够歪曲甚至戏剧性地改变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以及我们通过学术写作和演讲将其展现给其他人的方式。再一次,很可悲地,那些本该看起来熟悉的文本、思想和人可能会被故意的歪曲变得非常异质(foreign)。

陌生、差异以及基本的人性

对于避免文化阐释中的误解我有一些建议,在这里我又一次受到已故教授施皮泽的启发。第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更多的了解和更好的理解。熟悉一种语言的细微之处需要数年的努力,对数种语言达到足够的熟悉程度是可能的吗?当然是的,但这需要决心、献身和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学习语言的天赋。只是对于我这样缺少天资的人来说,实现这样的目标太难了。而且,人类的思想实在太容易懒惰,我们常常让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听命于别人的训教。所以对于研究我们还是诚实一些,严肃一些吧,还是开始行动吧,在有限的范围内争取做到最好。

但是我们在哪方面努力呢?在这点上,我再一次受到列奥·施皮泽自己的贡献的启发,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阅读技巧,尽管它们很重要。我说过,我们必须在拓展语言知识的同时努力加深文化理解。

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极为复杂的,这一点永远都不能被掩盖。但我

^① 见刘禾(Lydia H. Liu),《帝国碰撞:现代世界形成中的中国》(*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69)。

们太经常用一般化的方式去思考,而且这种一般化传染给了理论。这样的思想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们掩饰了我们实际知识的有限。由于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都要依靠一般化,所以我总是对其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理论有时似乎只是文字游戏,看谁能进行最聪明的语言表述。换句话说,理论可能听起来像是单纯的抽象概念,而非针对理解的具体指导。我已经说过,我觉得我们必须将理论作为潜在有效的手段进行评价,而要从事实中探求真理,也就是中国的老话“实事求是”。在文学方面这就意味着文本细读,也就是对任何复杂的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细微文学特征,对其新颖之处,对其陌生之处,甚至对其“外来性”给予特别认真的关注,不管最初它是以哪种语言书写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或是别的语言。

列奥·施皮泽在他的众多研究中坚持引用不加翻译的原文,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强调他所研究的具体文本片段的外来性和不同之处。如果我们只用一种语言工作,直接引用我们所指的文本是种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用多种语言工作,这同样是最好的手段。因此,在用一种语言研究另一种语言的文献时,我们应该将原文文本和译文都包括进我们的写作中。这样,如果读者同样懂得引文的语言他们就可以检验研究者的理解。即使读者不懂引文,这至少也突出了研究语言与创作语言的差异,语言的不同(如汉语和英语)与语言功能的不同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只要将原文印在译文旁边,我也赞同翻译,不管是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还是将古文译为现代文字,这样,两种文字的差异就是明显的。这也显示了对读者阅读能力和译者翻译技巧的尊重;同时,它还引起人们对理解的困难性——及必要性——给予持续的关注。^①

我相信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要求我们接受人类的共通性,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没有什么文本是真正“异质的”,只不过它们与我已有的阅读不同因而值得研究。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文本、什么语言、什么人类经验是如此异质以致不可理解的,只是我们需要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或容忍我们所阅读的任何东西。所有文本都是人类情感、经验和想象的产物,在这一共同基础上我们可以在所有文

^① 译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应该提供给读者多少文本外的信息。我相信带注释的译本不会影响要略过脚注的读者,但对更广泛的文化理解持严肃态度的读者则会受益于此。然而注释也可能过度,如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的五卷英译本,译者芮效卫(David Roy)(*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